

“研究军事、研究战争、研究打仗”专论

# 把握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着力点

■夏文祥 粟 操

引言

国防动员作为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桥梁与纽带,是积蓄国防潜力、提升国防实力、打赢未来战争的重要支撑。当前,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,国家安全面临风险挑战日趋复杂,军事革命和科技革命交织叠加,这些都对国防动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必须紧跟时代发展,紧扣战争需求、紧贴国情实际,找准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着力点,为打赢现代化战争、塑造大国博弈持久优势提供支撑。

## 根本在能力——聚力打造多维复合的动员体系能力

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,核心指向是体系能力。现代战争节奏持续加快,作战样式演化加速,要求国防动员从单域能力向体系能力转变。美以伊冲突表明,国防动员体系能力已经成为战争各方博弈的焦点。

把握国防动员体系能力的内涵。国防动员广域覆盖、供需转化、聚优运用,其能力并非传统的资源物理聚集,而是涵盖备、调、转、运、用等方面的体系能力。一是敏捷响应能力,要能够实时感知态势、精准研判需求、快速拆解任务,即时触发动员机制。二是快速转化能力,依托标准化预案和扁平化指挥,要能够将人、财、物、技、智等潜力快速转化为支持作战或应急任务的现实能力。三是高效整合能力,要能够把全域、多维、碎片的资源进行统筹整合,通过集成、重组、嵌入等方式,构建形成直通战场的组织力、供给力、保障力和实战力。四是动态平衡能力,要能够合理调控战时保障与平时建设、资源投入与效能产出、核心要求与多元适配、应急支援与持久续航的关系,实现支持作战与维持社会运转的合理平衡协调。

强化国防动员体系能力的导向。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,核心指向是加快战争持续能力的形成与转化。必须坚持向战为战、以战领建,把国防动员能力的指向与作战能力的指向一致起来,把战斗力标准全面落到国防动员规划建设中。要深入研究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,研析未来战争动员需求,立足极端条件、突出尖端优势、对接备战打仗,使动员能力的“供给侧”始终紧贴打赢制胜的“需求侧”。要归正国防动员化潜为

实、支撑胜战职能重心,把国防动员准备的基点放在支撑打赢智能时代的人民战争上,坚持“一切为了前线、一切为了打赢”,始终着眼战时、面向战场、培塑战力,储备资源、建强力量、完善机制,抓实演训,加紧建成与军事战略和能力要求相适应的新时代国防动员体系。

树立国防动员体系能力的标尺。国防动员担负着慑战、参战、援战、保战的职能使命,必须把锻造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体系能力作为国防动员的核心标尺,贯穿于国防动员各环节全过程。坚持边斗争、边备战、边建设,扎实做好动员先期展开、全程运用、随需随调的准备工作,细化完善平战快速转换机制,始终保持全时待战、随时能战良好状态。完善动员能力检验评估制度,以战争设计为本源,以动员行动为主线,以体系能力为标尺,一步一个台阶全面评估各领域国防动员能力,引领国防动员能力迭代优化。坚持以用促建,利用重大抢险救灾、军地联合演训、专项任务实践等时机,摸潜力资源现状、看预案案效度、查指挥链路贯通、拉力量组合使用、析动员实施效能,全面检验提高国防动员战建备水平。

## 关键靠建设——合力构建军地一体的能力涌现机制

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,是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,也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,把握建设的内涵要义和章法遵循至关重要。应聚焦国防动员的复杂性,以战略眼光把握时代要求,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,以务实举措夯实现代根基,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升级,逐步构建军地一体的国防动员能力涌现机制。

坚持需求牵引,激活能力涌现源头。需求牵引规划、规划主导资源配置是战略管理的基本规律,也是国防动员

的基本依据。当前主要堵点难点是需求的传播渠道不清、转化方式不明,解决的重点是建立军事需求解码制度,以精准提报、科学转化、快速确认、高效落实为主线,将军事领域的需求有效转化为国家科研、生产、建设等领域的技术指标、任务要求。要打破军地之间的专业壁垒,打通国防动员需求信息传递安全通道,确保需求翻译准确、传播完整、理解贯彻到位,真正落地抓实。突出聚焦能力“差值”,既注重发挥军队研究需求、论证需求、提出需求的牵引作用,也注重发挥地方主动预想任务、匹配军事需求、倒逼能力提升的能动作用,双向校准国防动员能力建设的靶标指向,激活供给侧的内在潜力。

突出规划引领,扭住能力涌现关键。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,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,也是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大制度安排。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,必须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棋局中统筹谋划推进,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中搞好顶层设计,融入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步部署实施,科学编制实施好国防动员建设“十五五”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。要着眼提高服务保障打赢高端战争的贡献率,突出非对称制衡,坚持规划主导资源配置,优先解决关键能力短板,突出紧缺急需能力提升,撬动整体能力全面进阶升级。

强化军地一体,畅通能力涌现渠道。国防动员连接需求与供给两端,涉及军队与地方两线,贯通经济与国防两域,加快其能力生成必须注重军地联动、统筹谋划、体系用力。要坚持军地协同,强化军地各级各部门“一盘棋”思想,推进动员理念军地契合、指挥机构军地联合、方案计划军地统合、力量依托军地融合,集约推进国防动员能力提升。突出建用一致,基于国防动员参战援战作战典型任务场景,贯通建设管理链路与指挥运用链路,既把“有什么、有多少、在哪里”等情况掌握准,也把“用什么、用多少、怎么用”等能力分析透,促进战动耦合、建用一致。

## 要义是加快——快速形成多快好省的能力跃迁路径

天下武功,唯快不破。足够的快,往往能够弥补体系的弱。美以伊冲突等近

几场国际冲突表明,现代战争的联动性、突发性、多变性趋势,对国防动员能力的生成与释放效率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,客观上要求加快国防动员能力生成的速度,“加快”二字凸显了国防动员能力建设的时代要义。

加强战略统筹谋划,在筹划设计上牵引能力跃迁。充分发挥国防动员体系优势、体制优势、体量优势,抓住我国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机遇,在统筹谋划快上下足功夫、做足文章。国防动员作为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具有军民一体、平战一体、前后一体的鲜明特性,要通过高效的战略统筹,既有效提升国家应急能力,又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,才能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。尤其是作为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、双向拉动的重要载体,国防动员必须具备高效的统筹能力,才能将产业优势、科技优势、人才优势、组织优势集聚为战略体系优势,为巩固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奠定坚实基础。

深化管理创新求快,在制度机制上推动能力跃迁。管理也是战斗力。要创新国防动员战略管理运行链路,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和快速转化机制,摒弃传统路径依赖,在技术赋能、机制创新、体系重构上提速发力,缩短国防动员能力生成周期。强化跨军地治理,破除军地二元结构壁垒、思维理念差异、条块分割限制,通过流程加载、职能融合、数智支撑,构建各司其职、紧密协作、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。融合军地采办标准,简化动员采购环节,优化预置预制的冗余设计,通过管理创新、制度创新压缩经济实力转化为作战能力的循环周期,保持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。

突出科技赋能促快,在方法手段上支撑能力跃迁。科学技术提高了人类生产和劳动的效能,提高了人类感知、认识世界的效能,机械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融合发展,正在系统而全面地赋能战争和战争准备过程。要注重动员理念更新、动员模式创新、动员行动革新,突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、尖端武器装备研发生产、新质力量队伍优化编组,依靠科技赋能引领国防动员能力加速“蝶变”,推动国防动员整体转型。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及反制能力供给与储备,降低准入门槛,拓展参与路径,丰富场景运用,切实打通现代科技有效聚合赋能的动员转化链路,持续培育壮大新域新质动员增长极,助推国防动员能力加快提升、创新提升、增效提升。

## 前沿探索

●适应未来战争快节奏、高风险、强对抗的指挥需求,未来人类指挥员将成为驾驭全域作战体系、主导战场决策逻辑、掌控作战终极胜负的“元决策者”

# 「元决策者」·指挥员角色的重塑

■李云杰 郭舒浩

随着军事智能化向纵深发展,智能化战争加速演进,传统“感知响应”的决策模式面临“决策饱和”与“认知迷雾”的双重困境,实现人类认知如优势与机器计算效能融合成为军事决策发展方向,人类指挥员的角色定位由此发生深刻变革。在由人类指挥员与智能系统构成的混合决策体系中,人类指挥员将作为智能化指挥体系“元决策者”实施“元决策”。“元决策者”不直接介入具体战术决策,而是通过科学构设规则、精准调配任务、高效协调关系,确保人机协同决策效能实现最优化。

把握“元决策者”的本质特征。“元决策”概念肇始于管理科学,意指“关于决策本身的决策”。“元决策者”相较传统指挥员,其本质特征体现为三大跃升。

决策层级的跃升。“元决策者”关注的不再是如何选择最佳作战方案,而是由谁(人或机器)以何种方式选择最佳作战方案。元决策活动发生在战略(宏观)层,涉及目标的设定、问题的界定和价值的权衡,而具体方案生成则交由战术(微观)层智能系统完成。这种层级跃升使指挥员从繁琐的战术决策中解脱出来,专注于更具战略意义的调控任务。

认知模式的转变。传统指挥决策依赖经验直觉与定性分析,而“元决策”更强调对决策系统本身的理性设计与动态调控。研究表明,直觉决策虽快速但受限于个人经验,而“元决策”建立在系统思维基础上,要求指挥员既理解人类认知规律,又掌握算法工作原理。这种双重认知能力使“元决策者”能够精准判断何种决策适合交由人类,何种适合委托算法,并在两者间建立高效协作机制。

权力性质的演化。“元决策者”的权力重心从直接命令转向间接调控,更多通过规则制定和资源分配施加影响,指挥员可在不同人工智能团队生成的竞争方案间进行权衡选择,这种权力行使方式比传统直接指挥更为间接但也更为根本。这种权力演化实质上是适应分布式作战环境的必然选择,有助于在激发智能系统自主性的同时保持人类的最终控制权。

厘清“元决策者”的核心职能。基于对智能化战争决策系统的解构,“元决策者”主要承担四大核心职能,共同构成其人机协同决策调控的基础框架。决策框架设计职能。这要求“元决策者”根据作战任务特点构建适配的人机决策系统结构,包括选择适当的人机互动模式,确定人机功能分配比例、设计反馈调节机制等。参考性研究表明(如特定政务热线领域),当AI承担高比例数据处理(如约83%)、人类聚焦关键性政策校准与创新设计(如约17%)时,系统效能较优。这一“黄金比例”虽非军事领域普适标准,但揭示了科学分工对效能跃升的关键作用。“元决策者”须综合任务性质、时间窗口、风险等级等多维因素,实施动态架构调整。

决策动态分配职能。这要求“元决策者”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,灵活调整人机决策权限。军事决策权分配绝非一成不变,必须随作战阶段演进、环境复杂度升降,系统表现起伏而动态优化。有效的权力分配需考虑任务层级:操作层可赋予算法高度自主权,追求毫秒级响应;战术层需人机紧密协同、协商决策;战略层必须由人类指挥员主导掌控,战略决策权牢牢掌握于最高指挥层级。这种弹性既能发挥机器速度优势,又能确保人类对关键决策的控制,是平衡作战效率与行动安全的锁钥。

决策过程监督职能。这要求“元决策者”推动人机协同决策全流程实施严密监控与及时校正,需设定科学决策质量评估指标,构建异常态势预警机制,实施严格过程审计等。由于智能系统存在“黑箱”的“不可解释性”风险,其决策可能隐含偏见或错误,“元决策者”须运用可解释AI技术提升透明度,组织对抗测试检验鲁棒性,设计冗余方案增强容错性。研究表明,当机器能清晰阐释决策逻辑时,人类信任度显著提升;当人类保有适度监督权时,系统安全性有效强化。“元决策者”须精准拿捏自主与可控的平衡点,既避免过度干预抑制系统活力,也防止监管缺位累积作战风险。

决策系统演进职能。这要求“元决策者”推动人机协同决策体系的持续优化与创新。智能化战争形态日新月异,决策系统必须与时俱进。“元决策者”应通过深入作战复盘、高强度兵棋推演、实战化实验演习等手段,精准识别决策短板,优化人机交互接口,迭

代更新算法模型,实现系统能力的螺旋式上升。促进人类智慧与机器智能在深度交互中催生新认知、新战法,构建共演进机制,不断突破能力边界,制胜未来复杂战场。

构建“元决策者”的能力体系。胜任“元决策者”角色,传统战术素养和指挥经验是基础,但更需构建以系统架构、算法治理、认知整合、弹性心智为支柱的新型能力体系,确保有效履行“元决策”核心职能。

系统架构能力。这是指设计、优化人机协同决策体系的能力。要求理解各参战单位组织模式的优劣,把握人机功能分配与能力创造的平衡点,实现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有机融合、优势互补。指挥员须具备系统工程思维,超越单一决策环节,从战争全局和决策链全过程进行架构设计。“元决策者”须立足部队使命、威胁环境与资源禀赋,设计最具韧性与效能的人机系统架构。

算法治理能力。这是指理解、评估、监管并引导智能算法军事应用的能力。要求精准把握算法优势边界与固有局限,实时监控运行状态,及时干预偏离预期的决策。研究显示,算法厌恶与算法依赖是两种常见误区,适度信任才是理想状态。“元决策者”须通过提升算法透明度、加强人员专业培训,优化人机交互界面等途径,构建健康、可靠的人机信任关系。尤其在涉及致命性自主武器等敏感领域,算法治理能力直接关乎军事伦理风险控制。

认知整合能力。这是指融合人类直觉经验与机器逻辑计算的跨维度认知能力。优秀指挥员的直觉常蕴含宝贵隐性知识,机器决策则基于海量显性数据,两者高度互补。“元决策者”需发展“双模认知”素养:既能运用人类的情境理解和灵活思维,又能借助机器的数据分析模式和模式识别,在更高层次实现认知整合。例如,将概率思维引入指挥决策,修正直觉偏差;或利用AI兵棋系统检验指挥构想,形成人机互鉴、迭代优化的认知闭环。

弹性心智能力。这是指在快节奏、高压、责任边界动态变化的人机混合决策环境中,保持稳定、高效、敏捷决策的心理调适与抗压能力。智能化战争加剧了决策时效压力与责任模糊挑战,“元决策者”应具备更强的认知韧性,实施科学作业管理意志力量资源,维持最佳决策状态。这种心理韧性是应对战争不确定性的基础保障。

总之,未来战争制胜的关键,不仅在于拥有更智能的武器装备,而且在于“掌握更智慧的决策能力”。因此,前瞻布局并科学锻造能够驾驭智能战争的“元决策者”,已是类型战争形态演变、制胜未来战争的时代必然要求。

# 谋定而后动 塑势以破局

——长平之战的谋势之道

■车东伟 杨 斐



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,秦赵两国倾国相争,百万大军云集长平(今山西高平)附近。秦以武安君白起为帅,赵初以廉颇统军,后改赵括为将。作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和围歼典范,长平之战历时三年,最终以秦军惨败、四十余万众被坑杀告终。此战重创赵国,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石,深刻改变了战国后期历史走向。

动摇其军心士气。关键在于塑造于我有利的战场舆论态势和心理优势,于无形中削弱敌作战意志,为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战机。

战术诱敌:以利动敌,创造决胜战机。“兵者,诡道也”。面对赵括的倾力出击,白起未急于决战,而是采取“以退为进”之策。秦军先以部分兵力接战,佯装不敌败退,骄纵赵括轻敌之心,诱使其主力脱离预设阵地和有利地形,不断深入。此战术虽付出局部兵力损失,却赢得全局战略主动,成功将赵军引入预设的袋形包围地域。秦军随即依托有利地形和预设阵地,完成对赵军主力的合围,使其陷入绝境。

信息化智能化战场态势瞬息万变,力量多元复杂,要求指挥员具备超常的战术灵活性与战场机动性。应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、人工智能算法和全域实时感知能力,辅助指挥员快速洞悉战场全貌,精准预判敌行动意图,大幅缩短“观察—判断—决策—行动”作战周期。强化指挥员在复杂多变环境中的临机决断能力,敢于在战术层面主动示弱、局部放弃,以换取战略全局的主动与决定性战机的创造。建立分布式、自适应、强韧性的指挥控制体系与跨域协同机制,确保各作战单元能深刻理解意图、自主灵活行动、紧密高效协同,在动态对抗中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,以最小代价达成最大战果。

分割围敌:裂阵破势,肢解敌作战体系。针对赵括急于求胜的心理,白起实施“诱敌深入、分割围歼”方略。在成功诱敌深入后,迅即投入两支精锐骑兵快速穿插,一举切断赵军退路。同时,另遣五千精骑迅猛突入赵军纵深,将其主力拦腰斩断、分割孤立,致其首尾难顾。这种精准的分割,使秦军得以在关键局部形成绝对优势兵力。随后,秦军主力依托有利地形构筑严密包围圈,将赵军合围于长平谷地,最终迫使其粮尽援绝,全军覆没。

现代战争的“分割围歼”,已从传统物理空间拓展至电磁频谱、网络空间、认知领域等多维全域。“分割”不仅是地理隔绝,更是对敌指挥体系、作战网络、关键节点和作战单元间联系的“断链”。通过干扰压制、网络攻击、认知欺骗等手段,断敌指挥链路使其成为“聋子”“瞎子”,瘫痪通信网络使其陷入“信息孤岛”,毁敌数据融合使其失去“体系联动”。运用无人作战集群、智能弹药与先进指挥信息系统,对敌要害节点实施精准点穴式打击与体系性割裂。利用天基侦察、电子侦测与网空监控,实时感知并有效阻断敌增援力量。实施多域联合协同作战,构建陆海空天电网一体化的立体封锁控制体系,陷敌于“插翅难飞”之境。关键在于从体系对抗视角精准识别敌作战链条的“七寸”,以全域联动力量实施断链破网,将敌完整体系肢解为互

不关联的碎片,实现分而歼之。

断链瘫痪:釜底抽薪,摧毁敌持续战力。“军无辎重则亡”。长平之战后期,秦军在完成分割围歼后,迅即聚焦于瘫痪赵军生命线。不仅彻底切断被围赵军主力与后方营垒的联系,更依托地形构筑多重防线,严密封锁赵军粮道和补给通道。这种“断敌归路、绝其粮道”的致命一击,使四十余万赵军彻底陷入孤立无援之境,军心瓦解,士气崩溃,在断粮多日后被迫投降。

现代后勤保障体系高度复杂,涵盖物资补给、装备维修、能源供应、卫勤救护、信息支撑等,是维系作战体系运转的生命线,亦是战时双方打击的重心。必须加速推进后勤保障智能化转型,运用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,提升我后勤体系的精确感知、实时响应、动态优化和智能决策水平,构建高效、韧性强、适应性好的现代化保障体系。同时,要善于运用侦察卫星、无人机蜂群、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等先进手段,全天候监控、全链路打击敌后勤保障体系。重点封锁摧毁敌运输通道、补给枢纽、能源设施、维修基地等关键节点,精准瘫痪其保障链条。通过釜底抽薪,断敌作战力量在丧失持续保障后迅速衰竭,摧毁其长期作战能力,为最终决胜创造决定性条件。

长平之战的硝烟虽已散去,但其蕴含的“谋势制胜”智慧穿越时空,熠熠生辉。我们更需深刻领悟“谋定而后动,塑势以破局”的哲学智慧,将传统谋略智慧与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相结合,不断创新战法训法,锤炼指挥艺术,提升联合全域作战能力,确保在未来战场上能够运筹帷幄、谋势制胜。